



我悲苦与幸福交织的归侨人生

北京 50年届 钟喜甲 1

钟喜甲，巴中50年届毕业生。1930年11月生于印尼，原籍广东蕉岭，九三学社社员。

人物履历

印尼万隆荷兰科技大学肄业，天津大学毕业，荷兰德尔伏特大学访问学者。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高级工程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西南资源联合开发总公司副总工程师。曾兼任交通部在京单位侨联主席，现任北京巴中校友会副会长，邦加侨友会会长。主持参与我国港口建设的施工、设计和科研项目，大小工程数百个。完成了主要专业技术工作成果22项，其中有四项属重大发明创造。

主要论文

著作、总结等33篇，其中有英、荷文各一篇存入荷兰大学资料室。曾荣获天津人民政府颁发的天津劳动模范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授予全国归国华侨先进模范代表，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天津市抗震救灾模范，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授予“三十年热心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荣誉证书等等，荣获



2010年11月,80岁生日照

勋章、奖状和荣誉证书共计18件。

1930年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像大多数人一样，孩提时的我一直把这个到处都是采矿场、椰子林、胡椒园的岛屿当作自己的家乡。

尽管我们钟家在印尼已经繁衍生息了五代，但自我懂事之日起，祖父和父亲就不断地告诉我，我的祖国叫“唐山”。尽管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唐山”与我从小长大的这个热带海岛有什么不同，更不懂得“唐山”于我而言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涵义，但是我依然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然而，那时懵懂年幼的我不曾想到的是，在以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我将为她哭，为她笑，

为她挥洒汗水，为她付出了我大半生的忠诚与信念。

我的祖籍是广东蕉岭县新铺镇，地处广东省东北部，大量的汉族客家民聚居于此，是著名的侨乡。蕉岭远离海岸，四面环山，看似封闭，却阻断不了这个地方与大海的不解之缘。

印度尼西亚由13700多个岛屿组成，其中有两个盛产锡矿的是邦加和勿里洞。从1710年开始邦加岛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锡矿产地。而勿里洞岛则到1823年才发现锡矿。由于巨港苏丹国的倒台，邦加曾于1812年落入英国人手里，1814年荷兰人以极高的代价，即用印度的科钦，换回对邦加的控制权。

荷兰殖民者费尽心思地榨取这里的锡矿资源。他们认为，印尼土著人不能吃苦，采锡矿必须靠中国劳工。中国劳工于是大批来到邦加。他们大部分是从粤、闽两省被骗来的。这就是移民史上常提到的“卖猪仔”。我的高祖就这样来到印尼邦加

岛，被驱赶到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的矿山当苦力，受到残酷的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劳苦一辈子也赎不起自己的人身自由。

峥嵘岁月在巴中

日本投降后我们一家移居雅加达。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荷兰殖民主义的统治，都深深地印在脑海中，我渴望接受中国的文化教育，开始进入八华中。后来才知道，八华中学当时是被国民党势力控制的一所学校，校内两派学生斗争很激烈，有时发展到相互斗殴的地步。

1947年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转学到联合中学，后改名为巴城中学（简称“巴中”）；“巴城”是印尼华侨对雅加达的荷兰语旧名巴达维亚的简称。这是一所进步学校，师资阵容强大，教学质量高。我从初三一直读到高三结束。我偏重理科，在巴中打下了较坚实的数理化基础，并接受爱国主义的进步思想，参加学校的一系列爱国活动与社会工作，奠定了要回祖国继续升学的理想。

在巴中，我遇到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教语文的钟仕民老师。他对我影响很大，经常给我们介绍一些进步思想和书籍，讲国内国共两党的情况，在我心中播下了向往红

色中国的种子，给我毕业后选择人生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没有钟老师的教导，就没有我日后毅然回国的决心。我参加学生会工作，时时听钟老师的指导。后来我才知道钟老师是从国内来的，是个立场鲜明的爱国主义者。那时，巴中刚建校不久，没有教室，我刚入学时是在三所华侨小学借校舍上课，学生分上下班上课，我们班下午上课。

我到巴中的第一年，就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和当时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张瑞元一起工作。建校委员会在1948年发动“百盾募捐”活动筹款建校，学生会成员都积极带领同学们参加这项活动，到社会上进行百盾募捐。我带着童子军小队找大企业募捐，有的企业家一听说是给巴中建校捐款都非常慷慨，立即开出万盾支票。两年后，新校舍果然建起来了，我们搬到新校舍，坐在亮堂的新教室里上课，心情格外的好，我更加发奋学习了。教职员工的待遇也得到了改善。

学生在课余还组织话剧团，经常排练思想进步的话剧演出。四年间，演出的话剧有：《父归》《法西斯细菌》《毕业前》《万世师表》《雷雨》《日出》等进步剧目。过去这些话剧都在华人聚居区演出，但是我认为这样演出影响不够广，便反复



我悲苦与幸福交织的归侨人生

北京 50年届 钟喜甲 2

找了雅加达荷兰皇家大剧团的荷兰经理，他答应了租给我们演出三场。荷兰皇家大剧团在当时是最豪华的娱乐场所，仅供白人和社会名流出入，专门演出音乐会、芭蕾舞之类，华人都极少光顾。我们打响了第一炮，在这里用普通话演出话剧，立即引起轰动，扩大了普通话的影响力，让雅加达各个阶层加深了对新中国的了解；而且由于票价略为提高，为筹建学校积累了很大一笔资金。

我记得钟仕民老师经常给我们讲一些爱国故事，为了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祖国的情况，我组织学生参加庆祝国庆节的活动、参加中国驻印尼大使介绍国内形势的报告会，也组织过部分同学听取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的讲话。这些活动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对我日后选择回国报效国家的人生道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毕业前，我还担任过全印尼华校中学生联合会的刊物发行部负责人。这份进步刊物由学生主编，宣传祖国解放战争，报道中国大陆的革命形势，向学生宣传进步和爱国思想。而我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使自己牢牢地确立了今后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把青春贡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

1950年，我高中毕业，去向有三种选择：去荷兰学习小提琴，当



1936年，祖父60岁生日合影

音乐家；去欧洲留学，当一门新科技专家；遵照祖父的嘱托回唐山摔打筋骨。

我自幼学提琴，在雅加达受到荷兰皇家大剧团演出的专业小提琴手的指

导，后来在荷兰人指挥的管弦乐队当上首席小提琴手，还在印尼广播电台演出过几场，那位导师认为我具有拉小提琴的天赋，多次动员我去荷兰，还答应资助并给我找专业老师继续培养琴艺。二舅买了一把1712年产的Stradivarius小提琴送我，爱琴天天贴在我心上，我也曾想过要当个音乐家。

去欧洲升学对我也有吸引力。我大哥在荷兰，三姑在美国，五姑在星洲，澳洲还有一些朋友，一位荷兰朋友还介绍我去荷兰德尔夫特大学，让我选择的大学很多，我脑子也好，去外国升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种选择是遵照祖父的遗愿回唐山去摔打筋骨。巴中的峥嵘岁月，奠定了我的爱国情

怀坚定不移，我放弃了前两种很有吸引力的选项，毅然选择了祖父的嘱托：“回唐山去摔打你的筋骨”。

唱着《叫我如何不想她》回国

在欧美同学会合唱团，吴灵芬教授曾指挥我们排练《叫我如何不想她》。她说：“你们都曾在异国他乡生活过，肯定会把这首歌唱好。”

是的，这首歌我非常熟悉，是交响在我心中的历史的回声。半个多世纪前，这首歌是我们东南亚归侨在第一次归国大浪潮中唱的主题歌。当今天再唱起“天上飘着些微云……叫我如何不想她”时，我不禁热泪盈眶。这个“她”——我的祖国母亲，指引着我的前程，激励着我的斗志，考验着我的毅力，我把自己的青春和一切都贡献给了她。

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一幕一幕真切地闪现在我眼前。在雅加达巴城中学的教室里，我们印尼归国学生团几

位领导人最后统计了归国人员名单，人数超过300人，成绩很大，使我们兴奋万分。当时从隔壁教室传来了优美的合唱歌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叫我如何不想她》。的确，令人感慨万分，这个“她”，近百年以来遭受了多少蹂躏和磨难，现在终于解放了，中华儿女齐欢庆，我们也很快就要投入她的怀抱。

1951年6月的一天，我们登上了荷兰KPM商船芝拉楞卡（Tjitjalengka）号，开始了回国的远航。万分激动的青年男女在抢占地盘，设法能在甲板上找到“领地”，打地铺睡觉，度过这充满着期待和向往的九天。

白天人们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船头，几位女同学带头领唱《叫我如何不想她》，顿时每个人都注视着北方，心中思念着伟大的祖国，不约而同地同声歌唱。

临到香港海域，我们开了联欢会，会上唱歌，奏乐也还是《叫我如何不想她》。为了“她”，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每个人把带回国的一切值钱的东西几乎都捐了出来，把联欢会推向了高潮。

第二天，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英国士兵把我们全体赶到大船底舱，挥舞着大枪一个地点数，如同赶牲口似地将我们赶上祖国派来接应的轮渡船。看

到即将送走绝望受辱的岁月，黎明即在前面，我们有着说不出的特别心情。《叫我如何不想她》的旋律一直回荡在我的思绪中，终于，在7月1日我们抵达了广州。

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回国大浪潮，长期侨居国外的海外赤子，得悉祖国解放，使他们看见了光明，给予他们无限的动力，冲破来自各方的阻力，想方设法回到祖国参加建设。当时从欧美归来的有识之士很少。大批成船归来的进步中学生都是从东南亚来的，其中从印度尼西亚来的最多。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归侨搭乘的船舶都是荷兰公司的商船，一条船乘300到800人。

回顾历史，200年前，荷兰商船，曾一船一船地将我国粤闽地带中国苦力运往印尼当“猪仔”，给殖民主义者采油挖矿。荷兰商船把我们的祖宗从澳门运往印尼，150年后，还是这些荷兰商船，把“猪仔”们的后代又从异国他乡运回广东。想到此，我不禁感慨万分。

1951年的归国浪潮中的历史景象永远不会消失，我记得当我们离开丹绒不绿港，大船徐徐离开码头，驶向大海，大家和亲人招手告别。唱着《叫我如何不想她》，豪迈的气概充满着心怀。“她”——祖国，母亲，充满着我的胸怀，指引着我的前



我悲苦与幸福交织的归侨人生

北京 50年届 钟喜甲 3

程,激励着我的斗志,考验着我的毅力。在此后几十年的人生路上,尽管我努力工作,也曾遭受到许多不公正待遇,我仍然不变的是一颗赤诚的爱国心。

而今,已经耄耋的我,可以无愧地说:我真正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把我的强国心付诸实现,献给了祖辈期望她强大的这块土地。

牢记祖父的教诲“回唐山去摔打你的筋骨”

风雨人生路,漫漫数十载。

太多太多的记忆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消散。可我的眼前却总是清晰地浮现出一位古稀老人慈祥而充满期望地嘱托孩子的情景:“回唐山去摔打你的筋骨!”(海外华侨将中国称呼为“唐山”)那个孩子就是一个不满九岁的我,那位老人就是我最尊敬的祖父。“回唐山去摔打你的筋骨”,这句话是祖父对我最真诚的期许与嘱托,成为伴我一生的座右铭。

祖父是钟家在印尼漂泊的第三代传人。生在邦加,长在印尼,最后也长眠在那个他奋斗了一生的小岛。然而我明白,纵然身在海外他乡,祖父仍然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祖辈的故土。他把一生赚来的财富贡献给孙中山的辛亥革命。

我心里默念着,“我一定会完成他的心愿,踏上中国的土地。”十几年之后,正是这句话伴我漂洋过海,回到了令他魂牵梦萦却永不能到达的中国。归国的客轮上,伴着《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歌声与期待,我带头将所携带的贵重财物捐献给了祖国的抗美援朝事业。

1951年回国后,我便考入天津大学水利系港口水道专业。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由于社会上极左思潮对“海外关系”的偏见,归侨难免受歧视,这些都挡不住我对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组织的向往,挡不住我对知识的渴求。

1955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第一工程处(天津)。从1955年到1977年在基层单位工作的22年中,坚持发明创造,在生产活动中攻克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推动了工程的迅速发展。在基层单位的22年中,我参与了港口建设的施工、设计和科研活动等大大小小工程百余项。一共完成了33项任务,取得了主要专业技术工作成果31项。其中有6项属于新工艺、新发明、新创造。

在基层单位的22年中,我荣获了先进工作者和科技发明等勋章、奖状和荣誉证书共计18件。其中直辖市级、部委级共10件,工程局和

单位共8件。其中,生产模范14枚,科技发明2枚,抗震救灾2枚。除了“文化革命”期间不评奖外,我几乎年年获奖。特别是天津市劳动模范,全国归侨先进分子等荣誉,使我深受鼓舞。

在基层单位工作的22年中,我在逆境中努力创造出成绩。在经常受到表彰的同时,也经常成为政治批判的对象。当时我心中口号是:“小车不倒只管推”。22年中我被迫写出几十万字的思想检查,仅在1981年,基层单位落实中央政策,通过交通部正式退回给我的交代材料就有18份186页。

1957年遇到了我第二个贵人,交通部刘济舟总工程师,在他的支持下,用先进工艺解决了建造码头打桩裂桩问题,从而使停工许久的码头施工工程得以恢复。

以后,又建造了第一个自动化混凝土搅拌机,改造成机械化预制厂,解决了军用码头建造港际托运海运方式的问题,大大促进了港口施工建设的进度。

“文革”期间“抓革命促生产”,武斗迫使生产停顿。我带动工人师傅,辛苦了一年多,建造了6.5M和4.6M高的两尊混凝土剁斧石毛主席像和批量生产35cm的吹塑小站像。可悲的是,最后被当成“

反革命”强迫劳动达三年之久,还差一点蹲20年监牢,幸亏天津市没有批准。

被抄家、扫地出门、监督劳动期间,我还和工人们一起制造了一台200吨船用液压机。我被抄家时,许多书信、施工日记、技术总结、有纪念意义的照片、纪念邮票、珍贵的族谱,都被抄走了。我最伤心的是音乐书籍、唱盘、留声机、在印尼获得的奖状。幸亏小提琴被儿子提走了放在他朋友家,我这把名贵的小提琴才逃过一劫。

回国前,我一有时间就拉琴,每隔几周就去剧院听交响乐,回国后至今竟一次都没有再去过剧院欣赏交响乐。拉小提琴被批判是“封、资、修”,我听党的话,不让拉琴就不拉。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一直没再动我心爱的琴。

抄家之后没过几天,我们就从36所的两间房子的住处被扫地出门,一家6口迁到一间只有12平方米的小砖房的千间宿舍,房顶是用木檩条搭起来的,又黑又潮,不得带家具,只带日用品和衣服。没有床铺,头几天全家都睡在砖头铺成的地面上。睡了几天,我才找来些木板,板皮,搭了一个三层的床铺,好像火车的硬席卧铺一样。底下我们两个大人睡,第二层老二,第三层老大和老

三,我岳母睡在只有两平方米的小厨房里。没有上下水,公共厕所在一排房子的最东头,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大茅坑。

生活的艰苦可以忍受,但精神和政治上的压力,是难以承受的。我们在那里受了四年的罪,饱尝各种辛酸。直到1972年落实政策,我们才终于离开千间宿舍,搬到64所十几平方米的房子,自来水和厕所都有了,生活才正常起来。

在下放到基层工作的这些年,尤其是“文革”遭受迫害的岁月中,我所能做的就是加大工作力度,用成绩来表现自己的坦然和证实自己的忠诚。

从1958年到“文革”结束,我每年都获得奖励和荣誉。而可笑的是,我一边在创造着各种成绩,获得各种荣誉,一边又在不断地被打倒。有几次,上午领导给我佩戴奖状,下午开我的批判会。

这段充满荣誉却又不断被批斗的生活,看似荒唐,却饱含了委屈与艰辛,但是我从没想要放弃。我得摔打我的筋骨,这是阿公告诫并期望我做到的。无论遭受怎样的不公和冤屈,我都不会停下为祖国作贡献的步伐,只要有了成果,我的心中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我悲苦与幸福交织的归侨人生

北京 50年届 钟喜甲 4

荣誉证书

1976年10月份“四人帮”垮台，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逐步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轨上来，我们的生活也终于迎来新的曙光。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我有机会考取荷兰德尔福特大学，并远渡重洋，以访问学者身份去留学。学成后，荷兰专家曾许诺给我优厚条件留在荷兰。我曾是老海归，荷兰再优厚的待遇，也没能阻挡我再当一回新海归。留学归来，将所学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建设事业，这是我生活的最大动力。

1981从荷兰回国后，我在交通部基本建设局工作，主抓航务工程系统质量管理。把用计算机管理生产的办法推广到基层单位，在国内是首次的。将交通部、国内商家和荷兰商家联

络起来，开展引进和承接许多新技术和工程项目，如广州的集装箱、上海造船机械设备制造厂家，在拉美、北非和非洲承建的水上工程均是由荷兰承包商转包来的。

1983组建交通部归侨联谊会，被交通部组织部任命担任首任联谊会主席。还发动云贵川等省发展空中飞艇事业，组织召开空中飞艇研讨会。

1985年调入中国西南能源联合开发总公司担任副总工程师后，组织西南交通调查、组织昆明勘探会议、中瑞农场联合开发会议，调查西南地区投资环境情况，写出四篇调查报告，提出投资方向。发挥自己曾在荷兰学习的优势，引进荷兰的人才、智力和技术。

1989年我正式退休后，我远离了工作第一线却丝毫没有减少我继续发挥余热的热情：为中荷多种项目

穿针引线，使荷中自行车合作的年产量增长了十几倍；为解决北京公交优先问题奔走献策；组织退休专家研制成功5N稀土项目；1965年荷兰发明的为延长新港码头防坡堤而用吸泥船海底取砂的办法，后来经过我建议，把它运用到中国的许多深水码头建造，以及最近用9个月时间建造南海7个岛礁的工程上。最后的第38项创意，是研发用底供水新法在家养花种菜，并建立垂直农场将粮油生产从田间进入工厂，要确保全国家老百姓能吃饱安全饭。……我坚信自己仍然老有可为。

几十年间，我在祖国的土地上尽情地摔打着自己的筋骨与灵魂，完成了38项创意，荣获24项奖状，写论文和文章46篇（其中存荷兰大学图书馆一荷一英）。无论面对任何挫折与苦难，从未想过退缩、消沉与放弃。即使面对国外优厚待遇的诱惑，也依然不为所动。因为我一直坚守着祖父的嘱咐和期望，他的强国梦始终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危难之中给予我帮助的尊师挚友。我的人生可谓三落三起，是钟仕明老师、刘济舟总工程师、子刚副部长三位贵人的出现，为我的生活带来了光明与希望。

一晃数十载。当

年对我寄予厚望的祖父最终没能亲眼看到我在祖国如何摔打筋骨，但我要说：我没有让你失望，我一直没有忘记你的嘱托，严格要求自己，尽力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我问心无愧。

我没有像祖父那样伟大，但我对子孙也充满了同样的期待。希望他们能从父辈、祖辈的经历，有所感悟，能让“回唐山去摔打筋骨”的精神在钟家代代传承、生生不息。老一辈已把自己的全部生命贡献给了国家，后生们要学习先辈的赤子之心，努力锤炼自己，摔打自己的筋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惧困难，勇敢前进，为国争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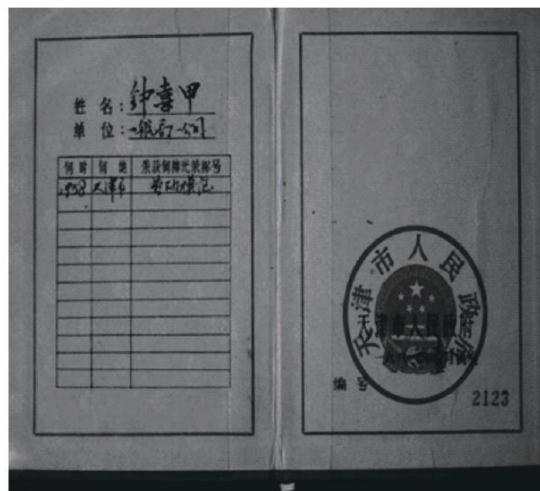
五六十年代归国浪潮中的爱国热血青年，分到各行各业，现在有的当上教授、研究员、工程师、有的是教师、医生、国家公务员，但无论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他们都是好样

的，都没有掉队，都是无名英雄。现在他们都已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母亲，完成了当初的心愿。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祖国正欣欣向荣的大踏步前进。在欧美各国留学和工作的高级人才先后纷纷回国，第二次归国大浪潮正在形成。国家急切需要他们，祖国人民欢迎他们归来。让我们继续高唱《叫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歌曲，唱到每一个留学生的心坎里，告诉们，“她”，我们的母亲在殷切等着海外归来的学子。

附录：钟喜甲《迎奥运大家给北京市洗个澡》发人深省的短文。

28年前我们在欧洲留学，住在城里租房，屋前屋后街道、马路都很干净。很奇怪，街上怎么会一尘不染，出门让人感到非常清爽和舒服。后来几件事情解开了我的疑惑，女房东，隔一段时间，早晨6点以



1958年荣获的劳动模范奖状



后排右五是钟喜甲



我悲苦与幸福交织的归侨人生

北京 50年届 钟喜甲 5

前进屋，我们都正在熟睡，有一次，我通过窗户往外窃看，发现她正在洗刷房前的人行道。

还有一天，我早起上火车站迎接国内来的同学，看见街上已有几位六七十岁老太太，用刷子和肥皂粉，认真洗刷她们屋前的人行道，刷得似乎自己屋里地板一样。快到火车站时，我还见到一位老太太，左手领着小狗，右手拎着装狗屎纸袋子，看见马路上散落一张小纸片，她很难地弯腰将纸片捡起来装进右手的纸袋里，我才意识到，这小国很干净，就是因为大家都爱惜她，大家齐心保护她，增加了她的环境美，是人们属有的一种文化素质问题。

北京奥运会快到了，我们该怎么办？大家能否做到不随地吐痰；不随地乱扔果皮屑，不随地乱倒垃圾，不随地乱泼污水，不随地大小便吗？实在令人担心。请看外国人对中国人随地吐痰是如何评论的：一位男士跟他朋友说：“中国的古老文化是让我们敬佩万分，但如果你到了北京看到中国人随地吐痰，会让你感到恶心不止”。来北京搭出租车一个外国人在网上写道：“汽车司机，使劲磕着嗓子，猛着摇下玻璃窗，往马路上吐出一大口痰。这奇特的景观，



钟喜甲(右二)在学社东城区委老龄委员会成立大会讲话

让人惊心动魄，我去过许多国家都没有见过，看起来，中国人随地吐痰的恶习是根深蒂固的，是他们古老文化的一部分？”

一位外国教授说道：“有一次，我夫人给中国饭馆电话订饭，一名中国送饭伙计给我们送来，在我园里吐了一口痰，从此老婆以后不再订他们的饭菜了。”早晨在公园遛弯，年轻人，老年人都在水泥路上随地吐痰，旁边许多游客没有一个人说话，水泥地上都是结成硬嘎的痰迹。没有办法，中国人就是有随地吐痰的恶习，我鼓起勇气对吐痰的老头说：“旁边绿地，你在那里吐痰还可以给植物当肥料，你吐到水泥地上，让上千上万个细菌飞扬，污染了其他游人，多不好呀”，对方瞪了我一眼，溜走了。其实，这种人在自家的地板上是不会乱吐痰的，这是一种漠视同类人的不道德行为。

听说，上海过去

在街道边上为痰多的人设了痰盂，出租车里也备有供吐痰用的小塑料袋，北京市也搞过罚款之类的活动，但收效甚微。关于乱扔果皮屑问题，我见过许多情景，最让人不放心的是，我们门口小学校旁，停下一辆接孩子上下学的军队客车，车内坐着许多小学生吃糖果和零食，他们随手将废纸屑、果皮扔出窗外，我说他们了，但回应是他们天真的微笑，没有办法，这是学校老师和家长们的的问题。后果是，长大了养成乱扔东西的癖好。

就在二环路边上，商店门口堆放了不少没用的东西常年不清理。每天出来散步要小心走路，否则就踩上地雷，狗屎或人吃饱呕吐的脏物。河边，雪白大理石桥栏杆上，密密麻麻挂满了黄黑色的痰迹，真让人膈应。还有更糟的是，桥下稍为隐蔽一点的地方，石头台阶处，一堆一堆臭气烘烘的屎尿

堆，发出一种特别的搔味，上面人行道上满街狗屎，下面桥下人尿人粪，无论是狗粪，人屎尿堆，其实都是人干的，中国人干的，这里难道就是中国的首都吗？

再说说我们住的高楼，原设有垃圾通道，各层倒下来的垃圾直接进入地层的垃圾车，住户每天将垃圾放在通道口边，清洁工每天将垃圾分类，无回收价值的随手倒入通道，可回收部分带下楼，卖给收破烂的，这样垃圾被分类了，塑料被回收了，清洁工也增加了收入，十几年卫生搞得很好，大家很满意。几年前突然有人将每层的通道门堵死了，听说是国资委下令堵的？？？从此垃圾就和人一起坐电梯下楼了。为了保持电梯的清洁和无味，抱垃圾用的塑料袋一层包一层。下梯后，大家都学姚明很准确地把垃圾投进垃圾车。垃圾车不在时，就随手放在垃圾桶上。到了夏天，大楼门口各种气味就相继挥发出来，出门别忘了捂着鼻子走。塑料袋白色污染直接被推倒垃圾收集场掩埋，给我们后代留着，以后再把垃圾挖开，将塑料袋一个一个捡出来处理吧。

我们大楼有清洁工，但她的任务是八小时上班当白领，穿高跟鞋，坐在办公桌软转椅上，打手机，

制毛衣，洗头、嗑瓜子，有时拿着短把扫帚比划比划，窗户玻璃不管擦，一年也墩不了一次地。这就是我们的环境卫生管理水平。

建议，组织发动北京市全民在2007年和2008年春天，至少两次给北京市洗大澡。算是我们北京人每个人都为奥运会出一点力气吧！香港的街道每周一次冲洗，当地人称之为“洗太平地”。

建议对自行车也和汽车一样要经常擦洗。还建议对大楼的卫生加强管理。要注意，北京市缺水，给她洗大澡尽可能不用自来水，靠河边的用河水，靠公园的用中水，都不靠的地方，发动居民用洗衣水、洗澡水，商店、工厂的废水来给我们美丽的北京洗个澡。收集的废水可以装桶里，洋灰池里，没有桶可以装塑料袋放在门前备用。大家还要做思想准备，等天上下大雨时，每人穿雨衣拿着刷子下马路刷洗街道。

给北京城洗澡的全民活动，我们的收获，不但是北京市的清洁、美丽，还有北京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大家会更努力、更自觉搞好城市卫生，人人也变成监督卫生的坚强环保卫士，北京市的肮脏环境也得救了。(完)

钟喜甲 九三学社交通支社 2007-06-10